

赤夜

罗国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下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黄埔军校大传

下

赤夜

罗国明 著

陸軍軍官學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埔军校大传/罗国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761-7

I. 黄... II. 罗...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87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9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75.25 印张 6 插页 1000 千字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套 定价: 98.00 元(上中下)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目 录)

黄埔军校大传 之 赤夜

第一章

- “三君子协定” (1)
- 蒋介石重讲“精诚团结” (9)
- “取消党内小组织令” (15)
- “你我都是浙江同乡” (20)
- 林彪初见周恩来 (24)
- 张静江宴请蒋先云 (28)

第二章

- 邵力子登报脱离“C·P” (34)
- 不寻常的邓、何对调 (39)
- 大浪淘沙 (43)
- 蒋介石亲组“黄埔军校同学会” (47)
- 《曾胡治兵语录》 (57)
- “中统”的诞生 (58)

第三章

- 张治中请求加入“C·P” (63)
- 李之龙在囚禁中 (66)

第四章

- 北伐序曲 (72)
- 加伦 (83)

“战时政治速成班”	(95)
热情洋溢的郭沫若加盟	(99)
周恩来的“家事”	(105)

第五章

蒋介石紧握着陈洁如的手	(110)
铁军	(115)
长沙会议	(119)
喋血贺胜桥	(125)
急电	(133)

第六章

刘峙谎报军情抢头功	(135)
贺龙举起了青天白日大旗	(142)
“C·P”之魅力	(148)
“肃清江西计划”	(154)
何应钦智取周荫人	(158)
蒋先云血洒临颖	(163)
“北伐战况报告”	(171)

第七章

蒋介石出尔反尔闹“迁都”	(174)
绝望的汉口之行	(181)
蒋、鲍决裂	(185)
国民政府签发的逮捕蒋介石令	(191)

第八章

“东方巴黎”	(198)
高官买不动邓演达	(205)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出现在蒋介石行宫	(210)

第九章

“救救校长”	(215)
欲盖弥彰	(223)

第十章

美龄小姐	(226)
何香凝的忠告	(230)
衣袋里掉出给美龄的情书	(239)
蒋介石以死相逼	(242)

第十一章

被强奸与被束缚的	(249)
绝密会议 “C·P一刻也不能再留”	(253)
大屠杀	(260)
蒋介石悬赏八万缉“伍豪”	(269)
在白色恐怖中	(273)

第十二章

凄冽的哨声划破黄埔岛的夜空	(277)
“我是共产党员”	(281)
熊雄之死	(288)
萧楚女被从病床上拖下	(292)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294)
通往南昌的路	(303)

第十三章

暴满的南石头监狱	(306)
英雄忠魂归何处	(307)

附录一：烈士名录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东江阵亡将士题名碑	(309)
猎德阵亡者名录	(312)
沙基惨案死难者名录	(312)
北伐烈士	(313)

附录二：各期国共名将录

黄埔军校教职员名将录一览表	(315)
---------------------	-------

黄埔军校第一期名将一览表	(320)
黄埔军校第二期名将一览表	(328)
黄埔军校第三期名将一览表	(329)
黄埔军校第四期名将一览表	(331)
黄埔军校第五期名将一览表	(335)
黄埔军校第六期和黄埔军校高级班名将一览表	(338)
黄埔军校各分校教职员及学生名将一览表	(339)

附录三：各期教职人员名录

陆军军官学校最初组织官长名录	(344)
第一期教职人员名录	(345)
第二期教职人员名录	(346)
第三期教职人员名录	(347)
第四期教职人员名录	(351)

附录四：同学录

第一期同学籍贯表	(356)
第二期同学籍贯表	(362)
第三期同学籍贯表	(367)
第四期同学籍贯表	(379)

(第一章)

“三君子协定”

蒋介石见宋子文来请,仍做出一番姿态,对复职视事,半推半就,自虎门又乘船往蒲州、香山等地尽情游览了几日,于4月1日方才踌躇满志地回到黄埔军校。

同一时间,回国述职的鲍罗廷,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提前结束了在苏联国内的假期,急急忙忙返回广州,处置因“3·20事件”广州所呈现的混乱局面,并修补在该事件中大受影响的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共方面的关系。

鲍罗廷到达广州当日,先在黄埔下船,径往黄埔军校蒋介石的办公室,与蒋介石“恳谈”。按照莫斯科“一切以维持中国国民党为领导力量的两党合作为基础”原则,仍把蒋介石视作国民党内的左派,寄予希望。晤谈中,多方承揽在过往国共两党合作中出现分歧的责任。蒋介石出于对继续获得苏联在武器等方面的援助,假意称:“现在总理不在了,听鲍先生的话就是听总理的话,早在3月21日,我就希望鲍顾问速回广州。”在获知蒋介石并没有与苏联彻底分裂的意向后,鲍连忙说:“从前,苏联援助土耳其革命,很多顾问同志都被杀害了。这次‘3月20日案件’,只不过是这个小误会,撤走几个顾问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随后,对蒋介石乘势提出的旨在全面限制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的各项要求,在未向中共方面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连连点头称“是”,予以赞同。

蒋介石晚年在忆及当时与鲍罗廷会商的情景时,说:

“当鲍罗廷和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主张都做合理解决。同时,我恪守国父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谈能够达到这8点协定(即,整理党务案)。”

次日,带着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方案,鲍罗廷、蒋介石、张静江相约在广州东山蒋介石的官邸,就“3·20事件”发生后广州的时局,中国国民革命的未来与苏联的关系,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关系,以及出兵北伐等国民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正式磋商。鲍罗廷代表苏联和共产国际,张静江代表中国国民党执、监两委和国民党元老派,蒋介石则作为汪精卫出走“养病”后,实际操纵广州局势,独掌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大权的新崛起的领袖,经过整整一天的磋商,达成了名噪一时的“三君子协定”:

- 一,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全面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
- 二,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
- 三,作为对蒋介石反击右派承诺的回应,鲍罗廷明确表示苏联将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以上三条并提交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请予通过。

鲍、蒋、张达成所谓君子协定,事先仍然未经与中共方面商量,甚至连滞留广州的中共中央特派全权代表张国焘,都一无所知。

据张国焘回忆:

“鲍罗廷回到广州……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曾说过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扣留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廷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哪里算哪里。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像

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他。

“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将3月20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间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廷曾分析3月20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中山先生健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3月20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会采取3月20日那种方式。’

“鲍罗廷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像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恶劣,也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3月20日的事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我笑着问他:请问鲍顾问口袋里这次带来了多少草?你这样措辞,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不置答。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廷开始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建他个人威信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责中共中央此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192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做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3月20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廷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3月20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当前的局势。

“鲍罗廷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3月20日事变的真正原因。但广东的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廷在这一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3月20日事变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会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地流传着；甚至有人说：5月15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天飞。鲍罗廷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里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我深深觉得鲍罗廷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是不是你愿意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鲍罗廷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向鲍罗廷郑重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廷，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

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廷考虑了一阵,拒绝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绝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做计议。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5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廷总是要求我信任他,申言绝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5月14日下午5时左右,鲍罗廷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廷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绝不会做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项会议的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廷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3月20日之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了鲍罗廷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廷再三动员,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晚8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廷的要求,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上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先要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1925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开幕，大会由张静江主持，蒋介石身着崭新的国民革命军呢服，全副武装，坐于主席台上。他以惯有的激昂的语调，藉“消除国共两党合作中的疑虑，杜绝纠纷”，“目中凶光毕露”，向大会提出了关于“整理党务的第一、二决议案”，提请大会通过。

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

一，确定整理党务之四项原则

- 1.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 2.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
- 3.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
- 4.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及其意义。

二，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联席会议

- 1.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5名，共产党代表3名组织之；
- 2.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
- 3.国民党党员对共产党党员，或共产党党员对国民党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
- 4.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
- 5.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
- 6.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决议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1次；
- 7.联席会议代表任期1年；
- 8.联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

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

- 1.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 2.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代表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保存；
- 3.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

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4.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5.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6.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7.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交联席会议追认;

8.本党党员未准予脱党之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派!”

“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中共堂堂一个政党,不遗余力投身来做国民革命工作,如今为什么要被动地受处罚,被整理,受如此凌辱?”

“干脆退出国民党,全力发展全国的工农革命运动!”

“.....”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在会上正式抛出后,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和广州各界一片大哗,无不感到吃惊和愤慨。

在当晚举行的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中共党团会议上,以周恩来、毛泽东、彭述之、陈延年等为代表的反对意见占据了主流,绝大多数人都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转而独立发展工农革命运动,以争取主动。

身为中共党团负责人的张国焘,根据会前鲍罗廷关于不管内容如何,都要向蒋介石表示支持的要求,此时显得不知所措,面对众人诘问,惟有一遍遍地掏出手绢擦额头上渗出的汗水。

鲍罗廷明确反对此时绝大多数人“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而强调暂且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实为处置当前国共合作所面临局面的一种策略,他说:

“中共现在退出国民党,实有违共产国际的意旨,若是从长远看,国

共将来肯定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也许,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便要实行分家,而现在应继续以容忍寻求合作,这于共产党人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仍是十分必要的。中共同志不必过分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其中,除了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片面的规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毛泽东当即站起来,对鲍国廷所谓以“容忍寻求合作”进行驳斥,并宣布辞去代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提议林伯渠、谭平山、吴玉章等亦主动辞去原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经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拒绝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该几项职务后来分别由蒋介石、叶楚伦等人担任。

周恩来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了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有了非常不正派的手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做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长实际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重讲“精诚团结”

黄埔军校，蒋介石的办公室。

晨8时许，入伍生总队长方鼎英接到蒋介石秘书陈立夫的电话，得知蒋介石已来到军校，正等待他关于近段时间军校诸方面情况的汇报，手里拿了个公文夹，匆匆赶到了这里。

一进门，方鼎英“啪”地给蒋介石行了个军礼。

蒋介石满脸堆笑，连忙起身：

“伯雄兄，快请坐，请坐，何必这样拘礼！”

蒋介石与方鼎英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方鼎英为第八期，而蒋介石为第十期，从这一点上，方鼎英还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学长；回国后，又曾同在许崇智的粤军司令部及1924年春孙中山组织湘、粤等军讨伐陈炯明的作战中有过交往。但是，自去年底受蒋介石力邀，从湘军来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总队长后，方鼎英仍时时对蒋介石以“校长”相称，礼貌有加。而蒋介石一方面认为对方鼎英较了解，抱有信任。更主要的，在刚刚过去的“3·20”风波当中，关键时刻，正是方鼎英出面，阻止了谭延闿、程潜、李济深等各军长们的联合出兵讨伐，挽救了当时对他极不利的危急局面，这使方鼎英在蒋介石心底里更多了一份盟友之情。

方鼎英打开公文夹，向蒋介石汇报军校政治、军事教育、学生管理以及其他方面工作的进展，蒋介石注意地听着，不时轻轻地点下头，“唔”一声。当方鼎英说到：

“3月20日案件以来，以及刚刚结束的二届二中全会传出的一些消息，在军校均引起很大的影响，造成许多师生思想上波动，尤其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这两派学生组织之间，时有激烈的争辩发生，以致数次中断授课。”

蒋介石警惕地问：“学生中主要有哪些人，官长有没有人参与？”

方鼎英望了蒋介石一眼，没有具体说出这些师生的名字，只是含糊道：

“两派的都有，也不限于某几个人，相互间的争辩愈加经常，有时一

遇到便要发生矛盾,直有水火不相容之势。目前孙文主义学会似又略占上风,而共产党同学与外间的秘密联系较以往明显增多。”

方鼎英说到这里,眼中露出几许焦虑。

蒋介石:“黄埔军校是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是本党的基础,做好黄埔军校的工作,领导好军校,牢牢把握好军校的一切,有着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我请伯雄兄到黄埔军校来,当我不在的时候主持军校的工作,把军校的一切托付于你,是把你当作自己的学长、兄长而如此。我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其他许多非我所情愿的复杂事务缠身,极少有时间直接在军校服务,而政局动荡,外间各种纷扰不断,对本校官生致巨大滋扰,无端添加了工作难度,但无论如何,军校的一切军事、政治教育断不能有丝毫松懈,我这里想对伯雄兄说一句话,那就是:天下可乱,本军校断不可乱!日前,想伯雄兄必知国民政府已通过北伐一案,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关系到国家兴亡、国民革命成败的大决战。受党国倚重,弟亦必将担起这个责任。短期内仍难以回校服务,而弟人在彼处,最牵念处惟有军校。”

方鼎英说:“既是北伐在即,我请求辞去在校职务,仍回我的第二军,随校长一并参加北伐。”

蒋介石笑着摇了摇头:“伯雄兄,此情我领下,难道在黄埔军校与参加北伐有什么区别,北伐能离得黄埔军校?况且,我前面已说过,黄埔军校乃本党命脉所在,倘大军出发,本校一切,完全交由你主持,也就是将本党命脉完全交付你了,责任如此重大,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不断为党国交出合格人材,即是对北伐最根本的支持,还怕将来没有你带兵打仗的机会吗?”

说到此处,蒋介石轻轻抿了一口水:“我已向国民政府举荐,由你代理校长职务,兼黄埔要塞司令!”

方鼎英闻言,忙说:“不可,千万不可,往日校长不在时,尚有诸多纠纷,一旦北伐开始,校长远去,我在军校如何应付?实话说,其他任何问题我都敢担当,惟校内国共两党派系斗争,我无法负责!”

蒋介石:“伯雄兄就不必再推辞了,方才所提问题,即我真的离开广州,凡涉政治或党务方面,你可多找国民党中央党部代主席张静江先生